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 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王明东 ○ 著

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因滇越铁路的修建从原本的封闭区域变成云南对外交往的门户，可以说这一时期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变迁与滇越铁路修建运营有密切关系。如果说，滇越铁路修建时即已揭开这些地区社会变迁的序幕，那么铁路建成后的变化则更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方面的变迁。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 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王明东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 王明东
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ISBN 978-7-5482-1936-1

I. ①民… II. ①王… III. ①铁路沿线—乡村—社会
变迁—研究—云南省—民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5908号

策划编辑: 邓立木 / 责任编辑: 李春艳 / 装帧设计: 贺 涛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王明东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375

字 数: 370千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936-1

定 价: 40.00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和少英

学术指导：马 戎 杨圣敏 王铭铭 彭兆荣 周 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四代 王子华 王明东 方 桢 刘劲荣

那金华 李国文 李若青 张宗红 杨宗亮

陈 斌 罗海麟 赵静冬 郭飞平 高登荣

黄彩文 韩忠太 雷 兵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H. R. Davies 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1979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5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36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0项,省部级课题50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2300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2013年7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俐佬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甸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以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遗产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前言

在申请课题立项时即已指明，本课题主要关注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昆明至河口沿线乡村社会变迁，因而本书所说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是指昆明至河口沿线乡村社会。这一地区因修建滇越铁路从原来的封闭区域变成云南对外交往的前沿，经历并见证了殖民掠夺、工业革命、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发展进程，构成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观测点。

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在修筑这条铁路时即开始变化，修筑铁路征用土地必然导致一部分百姓失地或少地，使一些民众依赖耕种土地的生计方式发生改变，充当修路工人、矿工等，而此时修路工人、矿工等遭受的剥削十分严重，如此，则少地或失地百姓的生活将更加贫困。一些人被迫沦为盗匪，民国时期滇南一带匪乱猖獗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观点。根据不平等条约，云南地方政府要负责征地、派兵丁保护等工作，其所需费用因地方财政困难请求中央政府支持，但因种种原因其所申请的经费未能拨付到位，这些费用最后仍然只能转嫁到地方百姓身上，如此则地方百姓贫困程度加深。另外，修路工人、矿工等遭受的非人待遇，使其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有了切身的体验，这就使这一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滇越铁路修筑之始，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将要面对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在外来侵略及封建剥削下的被动应对。

如果说，滇越铁路修建时即已揭开沿线地区社会变迁的序幕，那么铁路建成后的变化则更为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方面的变迁。

一、经济变迁

滇越铁路开通之前，铁路沿线乡村社会自然经济堡垒尚未被打破，耕织结合的生计方式广泛存在，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高。一条从昆明到滇东南的蔓耗、河口等码头的对外贸易商道上马帮络绎不绝，水上运输曾经是此时经蔓耗、河口等码头出境的外贸通道。但是，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外国商品涌入，铁路沿线广大乡村社会传统耕织结合的生产方式受到强烈冲击，传统手工业纺与织分

离,一些原来从事纺织业的农户不得不转变谋生方式。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失地农民增多,他们也被迫转变谋生方式。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如宜良所产大米就因个旧矿业的兴盛而有很大的销售空间,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沿线的森林被大量砍伐烧制成木炭销往个旧。鸦片是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流入市场的一种商品,民国时期云南乡村社会鸦片毒害一直未被根除,地方政府打着禁烟旗号,采取寓禁于征的做法,表面上禁止百姓种植大烟,暗中又允许百姓种植,因而大烟种植面积数量巨大,挤占了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这一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受到影响,云南有一段时间甚至从越南进口大米。一些军阀、官僚甚至借用滇越铁路走私鸦片大发横财,鸦片贸易甚至成为云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传统商道也因滇越铁路的修建而发生变更,经蔓耗、河口等码头装运货物出入境的方式,迅速被铁路运输取代,马帮迅速减少,依靠马帮运输谋生者被迫转行另谋生路。这一切现象都预示着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的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的曲折发展。

滇越铁路沿线城乡市场结构迅速发生变化,滇东南的蒙自被迫设立口岸,与同一时期的思茅、腾越等口岸相比,以大锡为主的蒙自口岸贸易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一度成为云南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和货物集散地。但是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昆明到河口所需时间,更因为滇越铁路绕开了蒙自,一度热闹的蒙自口岸,无论是省内外的商帮,还是国外的洋行,都纷纷往北迁入昆明。于是,昆明成为云南省的中心市场,进口货物多于此分销到全省各地,出口货物又汇集于此经滇越铁路运送出境。

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城乡市场网络不断扩大,省会城市昆明是这个市场网络的中心,县级市场成为了云南省市场网络的二级市场,而更多分布在乡村社会的市场为三级市场。这三个不同级别的市场发挥的市场功能也不同,如保障性供给、商品集散地、提供生产要素等。

一些城镇如宜良、开远、个旧、碧色寨等迅速兴起成为商业集镇,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商旅往来频繁。宜良为滇中主要产粮区,其产品主要销往个旧;开远煤炭因个旧锡矿的需求加大开采,个旧矿区云集了数以万计的矿工;滇越铁路与个碧石铁路交汇之处的碧色寨,中外客商云集,仓储货物堆积如山,一时之间成为“小香港”,据说在蒙自、昆明等地买不到的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到。因而宜良的米、开远的煤、个旧的锡、建水石屏等地的松炭等,成为铁路沿线乡村社会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格局。

一些外商洋行及外省商帮与本土的近代工矿企业密集地出现在滇越铁路沿线地区。以昆明为例,民国时期外商洋行前后有 34 家,还有四川、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外商帮。昆明的行业也呈增加的趋势,如 1907 年,昆明市区有 59 个行业。1923 年,增加到 84 个行业。另外,近代工矿企业密集地出现在滇越铁路的

沿线城镇，比如云南近代电力工业中的耀龙、通明、大光、汉光等电灯公司，分别设在昆明、开远、蒙自和河口等地。五金机械、化工、木材、火柴、卷烟、造纸、印刷等又主要集中在昆明。矿业中的大公司如开济煤矿公司、乌格煤矿公司、宏济公司、宝兴公司、个旧锡务公司等，集中在昆明、蒙自、开远、个旧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迁滇的内地企业也主要分布在以昆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可以说，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工矿企业的水平，代表了这一时期云南的工业水平，其面对的困难也是这一时期云南工业化所要面对的困难。

这一时期云南工矿企业所需的资金、技术、设备等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但是外国资本对云南产业的非均衡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民国时期的外国资本在云南主要投资于金融、商业、交通等部门，如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外商的洋行以及法国投资修建滇越铁路等；外省资本在云南的投资领域也主要在金融等领域，如数量众多的银行就是例证；此时进入云南的部分华侨资本曾试图投资实业，但总体成效并不显著。民国时期，云南资本市场的官僚资本于洋务运动时萌芽，唐继尧时期形成，随后又形成陆系（崇仁）和缪系（云台）两大财团。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由于与官僚、官府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流向银行、矿业、电力等暴利行业，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的工矿企业，均找得到官僚资本的身影。其表现出垄断和投机的特征，不可能助推铁路沿线乡村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而是相反，因为一般的民间资本在与其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于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官僚资本只关注并投资暴利行业，而普通民间资本由于力量弱小，难于引导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产业的均衡发展。因而，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的产业结构不可能均衡发展，这就注定了这些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工业化进程也必然因资金、技术、设备及社会环境的限制而受到阻碍。

虽然滇越铁路将西方工业文明带入云南，抗战时期内地企业大量迁滇，表面上看似加快了云南的工业化进程。但民国时期云南工业化进程缓慢且产业结构非均衡发展，这明显地表现在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工业对外资、外技等的严重依赖。东方汇理银行不仅垄断云南金融，对个旧锡业采取跟单押汇的做法，使个旧锡矿商人的利润降到最低，有时甚至出现贴本现象。滇越铁路修通后，个旧部分矿商选购机器进行生产，但是这些采矿、冶炼的机器设备几乎来自国外，设备的使用与维护不得不依赖外国的技术力量，仰承洋人鼻息。再则，个旧锡业表面上开采量增大，但国内冶炼技术低下多半只进行初步冶炼，转口贸易到香港后由外国公司再次进行冶炼才最终进行销售。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脆弱，自然经济的解体并没有使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外来商品的倾销及以大锡为主的出口贸易，都只是表明这些地区的资源被掠夺程度加深。近代工业的兴起仍然未能取代传统农业的地位，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未被打破。但是，民国时期云南农民失地现象加重，1912年到1933年间，佃农增加

10%，自耕农减少12%，说明农民失地人数增加，1932年云南就有100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①失地农民极大地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供给，正是由于市场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他们被雇佣后的工资收入就会很低。大多数人明知矿工工作艰辛且收入偏低，但仍有不少人到个旧矿区当矿工，个旧矿工最多时有15~16万人。即使是这样庞大的用工需求，却很少出现用工荒。由于民国时期云南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足，确保了个旧矿工的低成本供给，这也就使个旧矿商在不必要进行技术更新的前提下仍能获得利润。于是，发展较快的个旧锡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劳动力保障，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即可获得较大收益。个旧锡业开发留下很多后遗症，如森林资源遭破坏，空气、水、土壤等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民国时期，个旧矿区匪乱严重，争尖（硐尖、矿洞）夺矿的事层出不穷，这也使个旧矿业无法保障正常的社会生产环境。矿商不得不寻找军阀、官僚当靠山，这就为军阀、官僚进行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商矿的大部分利润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化成了军阀、官僚的权力寻租，这也成为个旧矿业经济正常发展的一大障碍。

民营的工矿企业由于资本额度小、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等缺陷，使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注定了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的二重性特征：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而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其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剥削而表现出抗争的一面。还由于这一地区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时必然表现出不彻底性。因而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人数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掌握着多数的社会财富，但他们成不了引导这些地区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

二、政治变迁

民国时期云南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自云南辛亥革命起义之后，接连发生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滇川黔桂四省军阀间的混战等，战事频繁、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无论是滇系军阀之间混战，还是滇系军阀与外省军阀的混战，都是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权力争夺战。为了维持巨额的军费开支，滇系军阀不惜靠经营鸦片获得巨额利润，将其所掌控的官僚资本染指金融、矿业、电力等行业，导致近代云南产业的非均衡发展。这些均是由于军阀混战的政治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民国时期，云南当局加强了对地方的设治与经营。民国初年，云南当局短暂沿用晚清府、厅、州、县的设置与经营模式。随后，云南废除了府、厅、州的设置，将厅、州等建制改为县，全省划为四区即滇中、滇南、滇西和开广，于各区

^① 肖良武：《近代云南劳动力市场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设观察使署。在河口、麻栗坡一带即河麻路边设对汛督办，县以下设市、村，设立市公所、村公所，由市长、村长管理地方事务。龙云执政云南后，在云南全省实行省、县两级制，将县分为三等，废除四区观察使，举办团保，推行保甲制。于此可见，民国时期云南当局对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的设治与经营，试图与内地整齐划一。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仍然残存于滇东南地区的土司，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地方统治者，尽管此时的土司形式上接受了民国政府的政治改革，比如有的土司成为地方乡镇保长，称呼上虽有变化，但他们实际掌控的地方政治、经济大权的状况并未改变。土司统治地区还保留着完备的传统治理模式，设置治理机关及管理人员，豢养兵丁、设置监狱，征收租赋杂税、摊派徭役，以传统方式进行司法审判等。土司处理与民国地方政府的关系时，采取对抗、对话、合作的方式。对抗就是双方在利益分配中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激烈冲突。民国中央政府或云南地方政府的大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与地方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无论是土司还是流官政府，他们对地方百姓的剥削手段相似，利益趋同，因而在对抗的同时，存在对话与合作的可能。对话就是双方在利益分配时表现出的意见表达，合作就是双方为共同利益纠合在一起，有些土司不仅卷入军阀混战，如龙体勤、普钧堂等出兵响应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有的甚至完全倒向国民党反动派，以人民为敌，妄图阻止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彻底走向反动深渊。民国时期，在滇东地区封建中央王朝政治体制下的二元政治格局得以保留。这种现象说明云南地方政府在土司统治地区力量薄弱，未能彻底完成改土归流。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滇东南地区的土司亦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力量，参与保家卫国的战争，为抵御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活跃在滇越铁路沿线的帮会、土匪等又成为另一股政治势力。滇越铁路沿线地区存在的青帮、红帮、一贯道等帮会，会员不仅有普通民众，还有地痞、流氓、官吏等。入会者须严格遵守帮会规则，会员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往往被反动势力加以利用，成为危害地方的黑恶势力。而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的匪乱更是猖獗，他们在城市乡村无恶不作，攻城略地，杀人越货，如建水县城数次被土匪攻占，县长被绑架更遑论普通百姓所受的灾难。有的土匪甚至与官府勾结组织护路队，借保护商旅之名敲诈勒索，还绑架政府官员，参与地方军阀混战。土匪吴学显所部曾击毙云南军阀顾品珍，因而吴学显被唐继尧委任为元武江防司令。土匪之间、土匪与土司之间常为争权夺利展开混战，土匪还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寻求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如李绍宗在得到法国人的支持后，由小股土匪变成云南省势力较大土匪。土匪甚至制造假钞，扰乱地方金融市场，如吴学显曾派蒋植到香港制造假钞。个旧矿区也是土匪活动的一个主要地区，土匪成为支持矿商之间争尖夺矿的黑恶势力。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民国时期滇越铁路

沿线乡村社会匪乱屡剿不灭，成为地方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

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政治图谋在于掌控云南政局，随心所欲地插手云南地方军政事务。民国时期云南地方军阀混战不休，对于军火的需求可想而知，法国利用云南军阀混战对军火需求之机走私军火，这样法国殖民者与云南军阀因相互需求而密切了关系。法国在蒙自设立海关派驻领事，法国驻蒙自领事馆还设有法国巡捕、越南警察、监狱等，可以不通过中国政府就逮捕抗法志士，甚至法国驻蒙自领事不通过地方官府就直接向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发照会，在云南形成了一股干预地方政务的外来势力。此外，他们还利用对滇越铁路的掌控随意干涉正常的商务往来。显然，这股外来的侵略势力影响了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变迁。

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由于地理区位及地方民众遭受的剥削压迫较重、工人相对集中，开展革命运动有了较好的基础，在云南近代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收回七府矿权、保路运动、河口起义、重九起义、临安起义、蒙自兵变等。在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后，滇越铁路沿线乡村成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活动的主要区域。滇越铁路沿线的昆明、宜良、蒙自等地，个碧石铁路沿线的个旧、建水等地，成为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开展革命运动的重点区域。中共地下党在滇越铁路工人、个旧矿工及贫苦百姓中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积极组织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城市乡村接连掀起革命风暴，从农村、矿山、铁路到城市的革命斗争不断开展，如蒙自小东山起义、滇越铁路工人罢工、“一二·一”运动、“七·一五”运动以及清匪反霸等，最后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生人民政权。因此，滇越铁路在民国时期的云南“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①。

总之，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形成了多重权力结构。第一，军阀混战后形成的政治环境，其试图将这一地区的设治与经营与内地整齐划一；第二，仍然残存的土司势力与云南当局之间在地方上的二元政治格局；第三，帮会、土匪横行，形成甚嚣尘上的黑恶势力；第四，外来侵略势力对地方军政事务的干预；第五，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后，在滇越铁路沿线开展了广泛深入的革命运动，最终成为领导人民群众推翻反动统治的新生政治力量。

三、文化变迁

就文化方面而言，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成为一条文化走廊。西南联大一部分师生经滇越铁路入滇，还在蒙自设立了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西南联大的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办学模式和理念，对于云南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云南高等教育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首先，西南联大的师生成为这一时期云南高校主要的师资力量，为壮大云南高等教育提供了师资力量。其次，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南联大学科设置为社会培养了紧缺专业技术人才。最后，西南联大师生深入云南乡村社会进行社会调查，传播进步思想，这就为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一些西南联大著名的教授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分散住在昆明郊区，有的甚至住到宜良，他们的言行举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亦很深远。西南联大的师生还利用假期到滇越铁路沿线的乡村开展社会调查活动，费孝通先生的魁阁派此间形成了许多重要的著作；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还到过石屏进行演讲；朱自清先生写下流传千古的《蒙自杂记》，他还与其他人在蒙自组织南湖诗社。这些著名专家、学者对滇越沿线乡村社会问题的关注、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无疑是近代云南文化史上的盛事，其影响的深远也是不言而喻的。最后，西南联大师生在重大历史关头，敢于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并将生死置之度外，这对于民主思想在云南的传播意义深远。西南联大成为云南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尽管打着殖民的烙印，但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仍在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以物质载体的形式出现，如个旧矿冶由土法生产向机器生产转变，电灯公司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照明方式，铁路的出现使出行方式由原来的人背马驮转变为利用铁路运输，因铁路运输需要而出现了云南的第一气象观测站，个碧石铁路修建时对滇越铁路修建技术的参照，昆明出现云南第一个电力提灌站、第一个自来水公司等。这一切都说明了伴随着殖民掠夺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在迫使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被动变迁的同时，这一地区的民众仍然能从被动中寻找主动，试图将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转化为发展地方社会生产力的技术手段。尽管这种技术转变是被动的、缓慢的，但是对于习惯传统生产方式的民众而言，毕竟迈出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的沉重步伐。从而使滇越铁路沿线的工业文明成为近代云南工业文明的标志性地区和带动地区。

滇越铁路沿线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对铁路沿线乡村社会产生了影响。首先，外来宗教的教规、教义以及教会开办的学校，使信教群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习俗等受到冲击。其次，教会还借建教堂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再将被其侵占的田地租给百姓耕种，对佃民进行剥削。最后，传教士还干涉地方司法。最后，有些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从事间谍活动。因而，民国时期滇越铁路沿线乡村社会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绝非单纯的宗教文化现象，这种宗教文化现象的背后有着文化侵略的痕迹。

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法式建筑在滇越铁路沿线不断增多，有许多方面的文化含义。其一，滇越铁路沿线火车站房、铁路员工的宿舍、医院等系列法式建筑，与铁路沿线传统民居在建筑风格上格格不入，这种标新立异的建筑成为法国殖民掠夺的建筑符号。其二，滇越铁路沿线其他一些公共建筑和私人民居，也因“赶时髦”而采用法式建筑，究其原因是民众对公共建筑及传统民居从建筑材料